

怀念我的父亲谢子长

20世纪30年代初,在父亲谢子长的指引下,我家的男丁都参加了红军,我那时只有几岁,但也随兄长随红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回想起来,那一段时光是我一生中最高兴最开心的。

播撒革命火种

1897年元月19日,谢子长诞生于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一个农家。1921年夏,谢子长投笔从戎,到山西太原学习军事。1923年6月,他以优异的成绩在“学兵团”结业,到河南、北平、天津等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4年春,谢子长回到家乡创办安定县民团,任“团总”。他带领民团剿土匪、惩办土豪劣绅、禁止军队任意拉差,被群众称为“谢青天”。此外,他还帮助学兵团同学李象九成立“学兵团”,学兵团和安定县民团后分别改编为石谦团第三、十二连,李象九和谢子长分别任连长。1925年冬,谢子长联络李象九、史唯然等再次奔赴北平,受教于共产党人李大钊、刘伯庄、耿炳光等人。不久,经白超然和白志诚介绍,谢子长在北大支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春,谢子长率部进驻安定县城,协助建立了中共安定特别支部。谢子长组织召开“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主持制定了《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组织大纲》《农民协会案》等8个决议案和《安定县农民协会章程》,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还在全县成立了1个县级、14个区级、100多个村级的农民协会、9个党支部。农民运动在安定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陕北的革命火种得以播撒。

粉碎两次“围剿”

1934年1月,谢子长回到陕北。当时,陕北党组织和游击队受到敌人的血腥镇压,处在十分困难的时期。谢子长经历了无数艰险,终于找到地下党组织。3月8日,他恢复了陕北红一支队。4个月后,在安定阳道岭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

为了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和转交中央给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的指示信,谢子长率陕北一、二、五支队南下,7月23日在南梁阎家洼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合。

7月25日召开了红二十六军、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及陕北特委的联席会议。在会上,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央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的两封指示信。会议决定由谢子长担任红四十二师政委,派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到陕北,配合陕北红军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会后,谢子长率部队北上,先后取得了安定景武塌、清涧县张家圪台、清涧河口镇战斗的胜利。在清涧河口镇战斗中,谢子长不幸胸部中弹,但依然带伤指挥部队作战。在胜利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后,谢子长由于伤势过重,再也无法坚持工作,暂时离队养伤。

1934年初夏的一天,谢子长在谈起家里为革命牺牲的亲人时,告诉我说:“共产党人就像毛脑柳树一样,割了这茬,那一茬还会长出来。二哥和同志们虽然有的被杀害了,有的被关进监狱,我还活着。咱们家,整个陕北还有这么多共产党员。共产党是杀不绝的,红军会更大。”

当年9月5日,谢子长给中央北方代表写信,汇报了回西北后的工作和恢复陕北红一支队、整顿红二十六军的任务完成情况。不久,谢子长由于伤势严重,无法履行红四十二师政委职责,于是建议由张秀山担任红四十二师政委。10月,北方局巡视员黄瀚(张子华)到陕北视察工作。黄瀚在郭洪涛陪同下到阳道岭看望望伤的谢子长。他们就谢子长和陕北特委对陕北、陕甘边党政统一领导和红军统一指挥的建议交换了意见。为粉碎国民党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谢子长推荐刘志丹来指挥两支红军作战。黄瀚将谢子长的建议带到北平,在向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汇报后,随即给陕北特委写信,同意陕北特委和谢子长的建议。

1934年11月14日,谢子长再次致信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对刘志丹和陕甘边根据地给予了高度评价。谢子长还致信刘志丹和陕甘边特委,建议红二十六军北上,由刘志丹指挥陕甘边、陕北两支红军并肩作战,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

1935年1月中旬,刘志丹率队从南梁来到安定。1935年腊月初,马明方、郭洪涛、白坚陪同刘志丹到柳沟探望受伤的谢子长,并就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党和军队统一领导和指挥问题,交换了意见。

1935年正月十八(或十九)那天,刘志丹到灯盏湾看望谢子长。谢子长和刘志丹一致同意要尽快成立西北军委,统一领导指挥陕甘边和陕北红军。刘志丹提出让谢子长担任西北军委主席,谢子长推让说:“我的伤病不好,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这副担子就由你挑,不要再挂我的名字了。”刘志丹说:“你是老大哥,是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你在陕北的名声大,人们早就称你为谢青天,只要你在世一天,主席就由你当。”并说:“你有勇,具体工作我负责,把你的名挂上。”两人为此再三谦让。最后谢子长说:“我以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确定你为军委主席。”刘志丹看到谢子长讲话艰难,便不再和他争,只说等到联席会议上再决定。

谢子长的支持和推荐,为刘志丹统一指挥陕甘边和陕北红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月5日,陕北特委和陕甘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了联



谢子长(右三)与学兵团同学在太原合影

“谢子长,虽死犹生”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由于病情恶化,不幸永远离开了我们,年仅38岁。临终之前,谢子长慈祥地对身边的家人说:“老百姓怕我死,这个心情好理解。只可惜我给他们做得事太少了。”记得那天外面下着大雪,老百姓都说:“这是老天爷为谢青天流泪啊。”

1935年秋,中共西北工委决定改谢子长的故乡安定县为子长县,永志纪念。1939年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谢子长的亲属,给谢子长以很高的评价。他说:“西北红军的创始人谢子长败不丧志,真了不起呀!”同时,毛泽东为谢子长烈士墓两次亲笔题词:“谢子长,民族英雄”;“谢子长,虽死犹生”,并亲笔为谢子长撰写了长达277字的碑文。

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为谢子长修建了陵园,举行了入葬典礼。毛泽东再次题词:“谢子长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也纷纷题词,高度评价了他的历史功绩。

谢子长带领全家17人参加了革命,全家出了9位烈士,留下6名遗孀。为此,毛泽东在瓦窑堡时,专门嘱咐秘书黄有凤说:“要好好照顾谢子长的家属,这是个英雄的家族。”

1981年10月3日,子长县党政军民各界举行了谢子长烈士立碑仪式。我应邀从北京赶去参加了仪式。当我看到新立的毛泽东题词和碑文,看到会场上重新出现的1946年中共西北局送给子长陵的挽联原文:“一心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我深深意识到,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革命先烈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人物春秋

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大姐跟随姐夫支援西北建设,把我从河南带到了西安。离开父母的那天,母亲搂着我,一直在叮嘱着什么,看得出她心中不舍,但我什么也不记得,只是美滋滋地欣赏姐姐给我穿上的新棉袄。

我家兄妹十二人,活下来的只有六个。大姐一家来西安是参加纺织厂建设的,离家时带走了我和二哥,那年,我5岁,二哥18岁。

刚来西安时没有地方住,就在西安市西郊农民家租了间房子。筹建处先在荒地上盖了30间简易平房,招了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开始盖房及生活区的建设。二哥和青工先住在那里,他们睡在用稻草铺的地上,二哥盖的是个又短又窄的薄被,到了冬天冻得睡不着觉,大家就抱在一起相互取暖,连老鼠在屋里跑来跑去,也不觉得怕了。

后来,一排排锯齿形厂房也很快建起来了,高大的烟囱开始冒烟。一天三次上工的鸣笛声传得很远,大喇叭上放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工人兴高采烈地上班。大姐和二哥跟着师傅们夜以继日,早出晚归忙着安装机器。很快工厂就开始生产了。那时,我才知道工厂叫西安纺织厂,即后来的陕西第十棉纺厂,是解放后新中国在西安建的第一个国营纺织厂。

我那时刚到上学年龄,学校离住的地方3里路,早上天不亮就往学校赶。晚上,大姐留宿在同学家。那时生活虽很艰苦,但在农村好。大姐生性好强,只怕我被城里人看不起,领了工资,就给我看几件漂亮的衣服。那时候的日子只觉得非常快乐,小伙伴整天在一起跳皮筋、荡秋千,我学习也很努力。

我是在纺织厂被纺织工人那种爱国奋斗的精神,哥哥姐姐爱党守纪律的品格熏陶长大的。高考前,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纺织专业。1964年,我如愿以偿考上了陕西工业大学纺织工程系,大学的第一课,著名的纺织专家、纺织系主任李有山教授给我们新生讲话:“纺织业是国家的重要工业,关乎民生,关乎国人的尊严。我们的技术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陕工大纺织系是共和国培养纺织工程师的摇篮,同学们要好好学习,锻炼身体,履行周总理提倡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号召。”那一刻,我和同学们的心中都充满了火一样的激情。

为了支援革命老区建设,1969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延安安塞绸厂工作。报到时,厂房刚建好,

往事

只装了几台布机和经纬机,搬丝还没有设备,靠从咸阳纺织厂拉纱织布。我被分配搞匀度检验,同分配来的校友带着从知青中招来的新工去杭州学习了。我那时已经有了孩子,没有去成。我的丈夫也是一个纺织工人,其父是解放前高级专科学校毕业的纺织大学生。解放后在党的培养下入了党,并担任企业的总工程师。那时,我丈夫因为家庭成分的影响没有上大学,文革后,他考上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毕业后从车间安排到技改工作,搞了细纱自动落纱等。后来,他担任厂里安全技术科长,在省纺织公司领导指导下,执笔编写了纺织设备安全生产手册,为纺织工人安全贡献了力量。

我老公对纺织技术工艺非常精通,在企业三年困难时期,领着职工搞“织棉毯”,文革后,他从“牛棚”解放出来,成为企业领导,把3万纱锭扩大到5万,70年代把陕西九棉建成了西北地区第一个生产“棉帘子布”和“帆布”的生产线,80年代末又扩建了锦纶帘子布分厂,为汽车轮胎更新生产了新机,同时为了解放军总后还生产出许多军用布,在他主持下制定了“维尼纶纱布”的国家标准。

我是1972年从延安调到丈夫所在工厂(陕西第九棉纺织厂),公公婆婆一家都在这里。婆婆是个出色的棉花检验工,在厂里工作了近三十年,家中的八个儿女,有五个都在厂里生产一线工作。我们家名副其实的纺织大家庭。

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纺织工业也不例外。全国各地的纺织厂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有国营、有私企,有搞民用布、有搞工业用布、有搞军工用布……国外的先进纺织设备也大量涌入。人们的服装服饰一改老传统,面料花色层出不穷,纺织用品也更加琳琅满目。我很欣慰,一家几代人,都为国家的纺织事业投身其中;我很骄傲,做到了为纺织工业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目标;我很自豪,我是纺织人。

我和中国纺织有情,我目睹了它70年来的成长和发展,为此贡献了我的一生。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用拙笔回忆了我和纺织的70年。纺织工业现在仍然是我国的创汇大户,从粗放生产到了集约式生产,纺织工人仍然是工人阶级的主力军。愿我国的纺织事业,繁花似锦,再创辉煌。 □张玉英

情系纺织七十年

路遥为何能与读者息息相通

钩沉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许多文学作品记录了我们的时代发生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人民性”的表征及其特点。如果从其承载主体的文学史发展脉络来看,历经脱胎于延安文艺传统的“十七年”文学,以及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启蒙、寻根文学、新写实与底层书写等,都体现着多样化的丰富的人民性内涵。作为追求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作家,路遥的《人



路遥和矿工在一起

生》《平凡的世界》等小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文学的人民性视野中更具典型性。

时代感与前瞻意识

路遥的创作,首先关注了大变革时期中国的“三农”问题,书写了“城乡交叉地带”人民的生存与生活,从整体上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而且相当规模地展现了当代中国变革的时代情绪及民众的心理动向。

曾经被淹没于当代文学繁荣思潮更迭发展中的路遥小说,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传统道德的审美理想、书写苦难的情感基调,及其传播方式与经典化过程中的群众参与历程,都可以说是从多个层面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人民性书写的审美追求及其意向。

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路遥的创作均是从社会历史的宏阔背景出发,有意识地拒绝1980年代文坛日新月异流派与技巧,执着于遵从和选择现实主义观念进行创作。

现在看来,当代文坛在先锋派文学之后所走过的轨迹,是逐渐扬弃形式主义而向着现实主义的坦途行进的,这恰好证明了路遥的清醒、独立以及来自于时代的自信。正如他所说,“对于作家来说,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当代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这样的自我要求为他的小说带来了强烈的时代感与前瞻意识。

同时,路遥的创作实践也极大地丰富了以往的现实主义要求及其内涵,与同时期的文学作品相比,《平凡的世界》首先尝试将经济单元置换为文化的、社会的单元,而其中所展示出的乡土视野也为日后的寻根文学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由于路遥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觉实践,使他在坚守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姿态,尽力吸收诸种文学观念及文学创作方法的优良,来营造自己的文学世界。这使他的现实主义书写有着这样的特点:在继承“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基础上,勇于实践,富于创造:一方面对当代中国极富震荡时期及变革年代的现实生活的各种关系,能够做更深入的把握,一方面又能发掘潜藏在生活深处的理想之光,将其熔铸到人物形象和生活形象中去。

为人民书写的文学追求

文学创作中的“人民性”表征充分地体现在对于人民的生存状态的悲悯情怀。路遥的作品有一种大悲悯、大同情的精神境界。这体现在他创作中的苦难书写,他

把个人成长的生命体验与当代中国“三农”的复杂社会问题充分结合,映现出整个时代的困境与人民生活的苦难。

苦难在路遥的创作中不仅是个人或群体的经历,更是社会问题的基调与背景,这种思想深度为路遥的创作增添了庄严感与悲剧力度。路遥不愿意掩饰和美化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他总是真切地、毫不怜惜地展示人世间的苦难,执着于这苦难,倾其全力于这苦难。

这样的写作姿态,促使他把广大民众的苦难写得深切、厚实,写得撼人心魄。在路遥的系列作品和《平凡的世界》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些普通民众的奋斗史,他们的历史沉重、悲壮而崇高;在这种苦难的奋斗史中,容纳着他们对历史、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对生命坚定不移的信念、追求和牺牲精神,充满着积极进取的乐观态度,用孙少平的话来讲:他通过“血火般的洗礼”,已经很“热爱”自己的苦难,并把自己从生活中得到的人生启示提升为“关于苦难的学说”。这种达观进取的人生态度,催人奋进,震人心弦。

我们从这苦难的奋斗史中得到的不是忧伤、凄婉和悲哀,而是厚重、刚健,满怀着昂扬激情的精神动力。它同时构成了路遥“苦难意识”的主旋律,以审美的形式回旋在平凡人的世界中。

“人民性”视野表现在路遥的创作中,还深刻表现在他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以伦理关系作为衡量道德之根本的审美倾向和价值取向。

路遥将农村一代又一代人生活的悲哀和



路遥故居

辛酸,同农村家庭生活、人伦关系的温暖情愫,溶解于人的经济、政治关系中,让人生在温馨而浓烈的人情氛围中,体现着他传统美德的深沉思考。

在《平凡的世界》中,作家将传统的人伦关系主要渗透于农村伦理生活肌理的描写中,劳动人家家庭生活中的爱及人伦义务,是古老传统中的人性人情因素在乡土中国社会中的优美形态。它的奇伟力量,溶化着巨大的人间苦难,维系着一代又一代的生命繁衍。对这种文化的确认,构成了路遥创作中普通人生命意识的重要表现形式,也蕴含着作家的人生信仰,是路遥为人民书写的重要表征。

路遥所塑造的系列人物形象,为作品建构起了强大的情感世界与道德境界,这种审美理想深度契合了本土文化血脉中所灌注的道德观与人生观,也充盈着作家书写“人民性”的思想内涵。

人民是成就小说经典化的主体

路遥文学作品的“人民性”特征又充分体现在它的传播方式与受众群体上。

长篇小說《平凡的世界》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送,可以看作是文学作品借助声音媒介进行受众转化的成功案例。在纸媒与声音媒介的互动中,路遥的小说通过视听系统收获了广泛的传播效果与庞大的读者听众。

他认为“写作过程中与当代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贯所珍视



路遥和莫言

的”,“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平凡的世界》通过广播进行全国播送的同时,他还处在小说第三部的创作阶段,同时展开的文学创作与听众反馈,为他的继续写作注入了积极的精神动力。而日后《平凡的世界》在民间读者心中的经典化过程,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显示出了“人民性”的基本特征。

人民不仅是小说的创作主体,表现主体、接受主体,还是成就小说实现经典化的历史主体。以人民为主体的文学评估体系的形成,是文学的人民性审美传统长久影响下的结果,它反过来塑造了中国民族的精神情怀与思想高度,也正因此形成了《平凡的世界》在当代民间所具有的持续阅读热情,及其在读者心中的重要位置。

从整体看来,路遥的创作、传播与经典化过程体现着作家创作的人民性的多重内涵。路遥的作品从其创作方法、精神指向,到审美理想、情感基调,再到写作姿态与身份意识,直至他的小说创作与受众反馈同步的特殊的传播历程,以及由广大民众的直接参与来反哺作品的完成,成就作品的历史地位,其中均显示出强烈的人民性特征。

作为一个在文学书写中始终以“人民性”标高看取生命意义与价值追求的当代作家,路遥对自己的人生使命有明确的认识。他非常重视作品的社会功利目的,坚信文学对社会改造的精神作用,在这一点上,他与茅盾、柳青等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主流作家一脉相承。

可以说,路遥是继茅盾、柳青之后步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自觉实践及富有创造性的文学追求,为当代文学提供了难得的“中国经验”。 □赵学勇